

# 上 編：總 論

## 第一章、朱子《四書集註》興盛於元代的原因

### 壹、前 言

朱子於慶元六年春（1200年）去世，享年七十一歲。從朱子三十歲開始，即著書立說不輟，他現存的經學著作計有：《周易本義》十二卷、《易學啟蒙》四卷、《蒼卦考誤》一卷、《詩集傳》八卷、《詩序辨說》一卷、《儀禮經傳通解》三十七卷、《孝經刊誤》一卷、《四書章句集注》十九卷、《四書或問》三十九卷、《論孟精義》三十四卷、《中庸輯略》二卷<sup>1</sup>。朱子於三十四歲起，即研究注釋《論語》，到他臨終前三日，仍在修改《大學誠意章》，由此一事看，不僅可知他著作態度的矜慎，也可知《四書》乃文公一生心力所繫<sup>2</sup>。朱子著書雖然矜慎精審如此，但在南宋末年，朱子之學竟被列為「偽學」，朱子一派被打為「偽學黨」<sup>3</sup>。其黨人被禁用，其書籍被禁讀，朱子學說積弱不振，朱子門人凋零殆盡。朱子弟子，也是女婿的黃榦曾說：

---

<sup>1</sup> 據周予同著、朱維鈞編：《周予同經學史論著選集》，頁180-頁186，（上海：人民出版社出版，一九九六年七月）。又《朱子語類》卷十六到卷九十二，都是在討論群經的一些問題，對研究朱子經學而言，也很重要。

<sup>2</sup> 王懋竑《朱子年譜》，頁21：「孝宗隆興元年癸未，三十四歲，《論語要義》、《論語訓蒙口義》成。」又頁226：「慶元六年三月辛酉，改《大學誠意章》。甲子，先生卒。」臺灣商務印書館，七十六年八月。又陳淳答其高弟陳沂曰：「此書（《論語集注》）與《孟子集注》及《大學中庸章句或問》等《四書》，時時修改，至屬續而後絕筆，最為精密。」宋陳淳撰：《北溪大全集》，（臺北：商務印書館景《四庫全書》本，民國七十五年），〈答陳伯澡四〉，卷二十六，頁4。

<sup>3</sup> 「偽學」一詞係慶元元年（1195年）六月，韓侂胄黨人劉德秀倡「偽學」之目以抨擊朱子。劉德秀以「貪瀆放肆，乃人之真情；潔廉好禮者，偽焉而已。」又云：「邪正之辨，無過真與偽而已。」見宋李心傳輯：《道命錄》，〈劉德秀論留丞相引偽學之徒以危社稷〉，《知不足齋叢書》本，（臺北：藝文印書館《百部叢書集成》之二十九），卷七上，頁10-頁14。

向來從學之士，今凋零殆盡。閩中則潘謙之、楊志仁、林正卿、林子武、李守約、李公晦。江西則甘吉父、黃去私、張元德。江東則李敬子、胡伯量、蔡元思。浙中則葉味道、潘子善、黃子洪。大約不過此數人而已

<sup>4</sup>。

朱子及其弟子被稱為「偽學黨」，在宋末遭受到以韓侂胄為首的無情攻擊及排除，其境遇之悲慘，可以想見<sup>5</sup>。但諷刺的是：此一爭鬥的最後勝利者卻是政治實力較弱的朱子。尤其韓侂胄死後，朱子學說大興，甚至到了元仁宗皇慶二年（西元一三一三年），朱子的《四書章句集注》（以下簡稱為《集注》）及經學著作竟被定為科場程試，不僅確立了朱子經學的一統時代，並下逮明清，影響了士人前途數百載，其轉變不可謂不大。全祖望說：

有元立國，無可稱者，惟學術尚未替，上雖賤之，下自趨之，是則洛閩之沾溉者宏也<sup>6</sup>。

全祖望認為，有元一代，學術未衰，是最值得稱道處，尤其是程、朱一派的影響沾溉最大，誠為的論。但朱子之學在晚宋，被打為偽學，到元仁宗時竟被定於一尊，其間不過短短百餘年。這百餘年來究竟有何原因，使朱子學說可以擺脫偽學噩運，敗部復活，甚至興盛昌明？是我所好奇，也是此篇與亟欲探討的。但本人學殖甚淺，而朱子一生著述卻博大精深，如欲以一篇短文就要全面探討元代朱子經學興盛的原因，必甚粗糙膚淺。因此本篇僅以朱子《集注》一書為限，希望透過此書於元代的風行普及，以窺元代學術盛況的一斑。

## 貳、論朱子《四書集註》興盛於元代的幾項原因

---

<sup>4</sup> 宋黃榦撰：《勉齋集》，（臺北：商務印書館景《四庫全書》本，七十五年三月初版），復李貫之兵部書，卷十六，頁7。

<sup>5</sup> 有關朱子「偽學」之禁種種，可參考《宋元學案》卷九七 慶元黨禁 及《續資治通鑒》卷一五四，慶元元年條。又 Conrad M. Schirokauer 著、中央研究院中美人文社會科學合作委員會譯：朱熹的政治生涯：一項內心衝突，在《中國歷史人物論集》，（臺北：正中書局，六十二年），頁219-256。及謝康倫著、何冠環譯 論偽學之禁，在《宋史論文選集》頁159至頁200，（國立編譯館印行，八十四年五月）。謝康倫說：「若說朱熹的勝利是身後的，則韓侂胄的失敗卻是生前的。」可想見朱子學說在他生時被壓迫的一斑。

<sup>6</sup> 清 黃宗羲等撰《宋元學案》，卷九五 蕭同諸儒學案，（臺北：河洛出版社，六十四

《新元史》曾對元代儒者宗法朱子，有下列敘述：

自趙復至中原，北方學者始讀朱子之書。許衡、蕭爽 講學為大師，皆誦法朱子者也。金履祥私淑於朱子之門，許謙又受業於履祥。朱子之學得履祥與謙而益尊。殆南、北混一，衡為國子祭酒，謙雖屢聘不起，為朝廷所禮敬。承學之士，聞而興起，《四書章句集註》及《近思錄》、小學通行於海內矣。延祐開科，遂以朱子為取士之規程。終元之世，莫之改易焉<sup>7</sup>。

柯紹忞這一段話值得注意之處有三：一、他所列舉有功於朱子之學的代表人物：北方的許衡、蕭爽；南方的金履祥、許謙，有其師承關係。而且他們都是「讀朱子之書」、「私淑於朱子之門」者，所以朱子之書可以代代相傳。二、朱子《四書章句集註》等之所以可風行全國，並訂為取士之規程，應歸功於朝廷的鼓勵提倡。三、朝廷之所以鼓勵提倡朱子之說，除《四書》所述乃一般人所應學習的公德、有助於社會秩序的維護、帝王權威的持續外，更重要的是這些讀《四書》的學者都是有為有守的風骨之士，足為「朝廷所禮敬」。除此之外，最根本且重要的是朱子《集注》一書嚴謹精粹，值得士人終其一生鑽研探究、並永續流傳。以下即據此四項，一一申述析論如後。

## 一、朱子《四書集註》的嚴謹可法，精粹可取

朱子所作《集注》，不僅彙集一人一家之學說，並且非一年一月之作，乃是投注了他畢生的生命與心血。就書中他所徵引的五十七家學者說法來看，可謂集宋學之大成，陳鐵凡謂：

《四書集註》徵引諸家解說，共計為九二三條。而漢、魏、梁、唐四代學者的解說，共只引了七十五條。（漢六十條、魏四條、梁一條、唐十條）；其餘八四八條，皆為宋儒之說。而在這八四八條中，二程夫子之說計為三〇四條，程門高第呂大臨、楊時、謝良佐、游酢、尹焞之說二五六，兩共五六〇條，已占全數三分之二以上。其餘亦皆程門有關學者，或二程之再傳、三傳弟子之說。其他諸家的徵引，不過是點綴而已。所

---

年三月)。

<sup>7</sup> 清 柯紹忞撰：《新元史 儒林傳序》，卷二三四，頁1，（臺北：藝文印書館，四十五年）。

以我說，《四書集注》不只集宋學之大成，而且是傳伊洛一家之學。這從張子只引三十餘條，周子只引一條，就可以推知了<sup>8</sup>。

雖然朱子綜合了濂、洛、關各家說，作成《集注》，但對這麼多家的學說，朱子並非全然繼承抄襲，他是非常斟酌取捨的，他說自己：

某釋經，每下一字，直是稱等輕重，方敢寫出<sup>9</sup>。

又說自己安排各家先後的原則是：

《集注》於正文之下正解說字訓文義，與聖經正義。如諸家之說有切當明白者，即引用而不沒其名。如《學而》首章，先尹氏而後程子，亦只是順正文解下來，非有高下去取也。章末用圈，而列諸家之說者，或文外之意，而於正文有所發明，不容略去。或通論一章之意反後，其說切要，而不可不知也<sup>10</sup>。

他不只費心地網羅收集，斟酌取捨諸家說法，並且是經年累月，持續不輟地著作、修改。就以《集注》一書來說，便花了四十多年的心血。朱子自云：

某於《論》、《孟》，四十餘年理會，中間逐字稱等，不教偏些子，學者將註處宜仔細看。某所解《語》、《孟》和訓詁，註在下面，要人精粗本末字字為咀嚼過。此書某自三十歲便下功夫，到而今改猶未了，不是草草看<sup>11</sup>。

即若是《論語集注》一書，錢穆說：

朱子大約三十四歲時即開始從事於《論語》有關的著作，到四十八歲《論語集注》寫成，前後花了十四年工夫，但此後還時時改寫。從他的《文集》和《語類》中看，得之他隨時修改的情形。他五十歲時知南康郡，公務繁忙，曾教他高第弟子黃榦讀《論語》，對各家說法，再加研究，五十四歲時，又寫信給人說：我對《論》、《孟》二書，雖然用功一輩子，粗有成就，然今日讀之，一、二大節目處，仍有謬誤，六十七

---

<sup>8</sup> 陳鐵凡著：《四書章句集注考源》，《論孟研究論集》，頁 68，（臺北：黎明文化事業公司出版，七十一年十月）。

<sup>9</sup> 《朱子年譜》，頁 67。

<sup>10</sup> 《朱子年譜》，頁 66-67。朱子又說：「《集注》中解有兩說相似而少異者，亦要相資，有說全別者，是未定也。」問：「《集注》有兩存者，何者為長？」曰：「使某見得長底時，豈復存其短底。只為是二說皆通，故并存之，然必有一說合得聖人本意。但不可知耳。」又曰：「大率兩說，前一說勝。」

歲時，更說：南康所刻《論語集註》，雖為成書後改定本，但仍有許多不愜意處，再待改定。我們由《集註》與《或問》之間的歧義，可以窺見朱子用心的經過。<sup>12</sup>

因為有「四十餘年理會」，所以他對自己的著作很具自信，朱子自稱《論語集註》如在秤上稱過一般：

《論語集註》如秤上稱來無異，不高些，不低些，自是學者不肯用功看。

<sup>13</sup>

正因為他著作時的矜慎若此，所以他殷殷告誡學者對《集註》「宜仔細看」、「不是草草看」：

《精義》是許多語言，而《集註》能有幾何語言，一字是一字，有一字當百十字底，公等都把等閒看了<sup>14</sup>。

在朱子六十一歲時，刊四經四子書于郡，撰 刊四經完成告先聖文，以示其無報於儒學傳承<sup>15</sup>。自此以後，即使朝爭不斷，但朱子的《集註》一直為學者所宗，士人所習，下衍數百年。故皮錫瑞說：

漢學至鄭君而集大成，於是鄭學行數百年；宋學至朱子而集大成，於是朱學行數百年。懿彼兩賢，師法百祀。其巍然為一代大宗者，非特以學術之閎通，實由制行之高卓也<sup>16</sup>。

蓋宋代有閎通的學術，朱子具高卓之制行，宜乎為一代之大宗。

## 二、宋、元儒者一脈相傳的師承關係

朱子學說能在元代大為興盛，其中最重要的原因，陳榮捷說乃是朱子門人之力：

然朱子學系之能在元明清大樹旗幟者，固非幸運而實有其因素也。因素

---

<sup>11</sup> 《朱子年譜》，頁 66。

<sup>12</sup> 錢穆 談朱子的論語集註，〈《孔子與論語》，頁 28-頁 29，（臺北：聯經出版事業公司，八十年十二月）。

<sup>13</sup> 《朱子年譜》，頁 66。

<sup>14</sup> 《朱子年譜》，頁 66。

<sup>15</sup> 宋朱熹撰，郭齊、尹波點校：《朱熹集》，卷八十六，頁 4440，（四川：四川教育出版社，一九九六年十月一版）。

<sup>16</sup> 清·皮錫瑞著、周予同注：《經學歷史》，頁 281，（臺北：河洛出版社，六十三年九月）。

不一，而門人乃其極重要者<sup>17</sup>。

此處陳氏所舉朱子門人如：柴中行、陳埴、楊履正、蔡元定、陳淳、黃榦，均受教於朱子，是真正得其門者。但如只靠這些弟子，朱子之學恐將隨宋之被滅而無疾以終。其實，朱子再傳、三傳、甚至是私淑弟子之於元朝，他們或倡朱學於朝，或講授朱學於野，才是振興諸子學說之最力者。此篇我們將廣義地看待所謂朱子門人，畢竟元代諸儒，雖未及於朱子之門，但他們對朱子之崇敬與熱忱，是絲毫不遜於及門諸弟子的。

明代張溥曾說元代儒者在儒學傳承的地域與貢獻：

北方之學，起自趙復、許衡；尊而明之者姚樞、竇默也。儒者世繼，傳人不絕：世祖時，有容城劉因；成宗時，有蘭谿金履祥、奉元蕭爽、緱山杜瑛；文宗時，有崇仁吳澄；順帝時，有休寧陳櫟、婺源胡一桂、金華許謙、資州黃澤之倫。咸明道學、修經傳，濂、洛、關、閩，家諷戶習，著述之盛，冠於儒林，入裸國而皆章甫，莫能議也。<sup>18</sup>

蓋張溥以為元代儒者，地不分南北，通元之世，元儒皆能承繼宋代學術，傳續不絕。他們講明道學、修習經傳，因而「濂、洛、關、閩，家諷戶習，著述之盛，冠於儒林」。清 黃百家分析元代儒者，則專就南方之儒而言：

黃勉齋榦的朱子之正統。其門人一傳於何北山基，以遞傳於王魯齋柏，金仁山履祥，許白雲謙。又於江右傳饒雙峰魯，其後遂有吳草廬澄，上接朱子之經學，可謂盛矣<sup>19</sup>。

---

<sup>17</sup> 陳榮捷：《朱門之特色及其意義》，在其所著《朱學論集》一書內，頁 290，（臺灣：學生書局，七十七年四月）。陳榮捷又說：「朱學之隆，而能滿播全國，則無數門人之力也。門人大都以傳道為職志。繼朱子而教學者大有其人，且從游以數百計者，有柴中行、陳埴、楊履正，其門徒之眾，可以想見。彼等或築書院、或掌教、或會講。當時書院林立，只《朱子實紀》所述與朱子有關之書院已有二十有七。《大明一統志》幾每縣有之，朱子之徒實專其利，結果朱子之徒盈天下。於是在上有經筵之設，在中考試制度，在下有書院之宣教，皆以朱子所訂《四書》及其《集註》為基礎。朱子之學完整齊全。體用兼顧，誠明並重。由太極而陰陽理氣而至於中正仁義修齊治平。學子一人，未必能傳其全面。故蔡元定專呂律象數，陳淳專字義，黃榦則重道統與居理窮敬。朱子之學，獨手難繼，故非全體之力不可。」頁 291 - 292。

<sup>18</sup> 明陳邦瞻著、明張溥增刊：《元史紀事本末、諸儒出處學問之》，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一九九四年七月影清光緒年間廣雅書局刊本），卷十六，頁 37。

<sup>19</sup> 《宋元學案》，卷八三 雙峰學案。又陳榮捷《元代之朱子學》一文以為，元代儒學不論南方、北方，均係黃榦所傳朱子之學。他說：「北方之新儒學與南方之新儒學，俱輻輳於

黃百家認為，在這些南方之儒中，不論是黃榦以下的何基、王柏、金履祥、許謙等北山學派，或傳於江右的饒魯、吳澄，都「上接朱子之經學」。我們依循著柯紹忞、黃百家所示的學術傳承關係來看，由宋末至元，朱子一派經學思想是持續不輟且愈發壯大的。先以北方學者來說，北方諸儒自姚樞、趙復表章程朱之學，並刊刻其書，北方學者始知有程朱之學。趙復雖未及朱子或其弟子之門，但他作《傳道圖》、著《伊洛發揮》、作《希賢錄》、著《師友圖》等「以寓私淑之志」的用心，都可見他以朱門自居的意義<sup>20</sup>。其後許衡於趙復處錄程朱所著書以歸，謂其徒曰：「曩所授受皆非，今始聞進學之序」<sup>21</sup>。於是大開庭戶，與弟子講論儒學，終於扭轉北方崇尚蘇學的風氣，使程朱之學定於一尊。即以本篇為主題的《四書》類著作來說，今日仍可見許衡所著作的《大學要略直說》一卷、《中庸直解》一卷，亡佚的並有《魯齋大學詩解》一卷及《孟子標題》<sup>22</sup>。蘇天爵引其《文集序》說他在北方發揚程朱之學的功勞：

伊川歿二十餘年而文公生焉，繼程氏之學，集厥大成，未能遍中州也。

文公歿十年而魯齋先生生焉，聖朝道學一脈，迺自先生發之。至今學術正，人心一，不為邪論曲學所勝，先生力也。所以繼往聖、開來學，功不在文公下。<sup>23</sup>

文中將許衡與伊川、朱子並列，其推重若此。許衡雖非朱子門人，但他精求朱子之學的苦心，傳續朱子之學的功勞，絕不亞於親炙於朱子的門人。又如北方與許衡同樣傳趙復之學的為劉因，他生於蒙古滅金之後，元軍南下滅宋之際，他雖多次被徵召，卻幾乎隱逸以終。在學問上，他不以經學上的訓詁疏釋為滿足，以為「聖人精義，殆不止此。」及見周、程、張、邵、朱、呂之書曰：「邵，至大也；周，至精也；程，至正也；朱子，極其大，盡其精，而貫之以正也。」

---

朱子。更為精簡言之，亦即輻輳於黃榦所傳朱子之學。浙之金華一線與江西一線俱源自黃榦。趙復傳於北方之新儒學，即程朱之新儒學，雖未言及黃榦，但程朱之學實即朱子之學，而在元代流行之朱子學，其闡揚者厥為黃榦，此俱屬顯然。」《朱學論集》，頁 302。

<sup>20</sup> 明 宋濂等著：《元史》，卷一五八 姚樞傳，卷一八九 趙復傳，（臺北：鼎文書局排印本，八十一年七月五版）。

<sup>21</sup> 《元史》，卷一五八 姚樞傳。

<sup>22</sup> 此處所列書目，主要依據《經義考》所錄為主，下同，不復說明。清 朱彝尊著：《經義考》，（臺灣：中華書局景四部備要本，六十八年二月）。

<sup>23</sup> 元 蘇天爵輯撰，姚景安點校：《元朝名臣事略》，卷八，頁 179。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一九九六年八月）。

<sup>24</sup>，他醉心於朱學如此。今天，我們仍可見其《四書集義精要》三十六卷<sup>25</sup>。與劉因游的林起宗則著有《論語圖》<sup>26</sup>。凡此，都可見朱子《集注》之於北方發揚光大的概況。

其次，我們看南方學界情形，自朱子之後，諸儒發揚朱子《集注》的學者及著作更是燦然可觀。先以黃榦而言，其《四書》類的著作有：《論語注義問答通釋》十卷、《孟子講義》一卷、《大學章句疏義》一卷、《大學聖經解》一卷、《中庸續說》一篇、《中庸總論》一篇、《四書紀聞》等。黃榦之學傳予何北山基，北山取《語錄》精義與《章句》、《集注》相發揮，而有《論語發揮》、《大學發揮》四卷、《中庸發揮》八卷。北山之學傳王魯齋柏，王魯齋在《四書》類的著作計有：《論語衍義》七卷、《論語通旨》二十卷、《孟子通旨》七卷、《大學》、《訂古中庸》二卷、《標注四書》。除魯齋外，元儒倪公晦，也師事何北山，作《學庸約說》<sup>27</sup>。北山、魯齋之後，至金履祥，時代已正式步入元朝，對元代諸儒尤其有深刻重要的影響<sup>28</sup>。仁山履祥自以為是「文公忠臣」，我們看他的著作名為：《論語集注考證》十卷、《孟子集注考證》七卷、《大學章句疏義》一卷、《大學指義》一卷，便可知他發揮並考訂朱子《集注》為己任的用心。今除《大學指義》亡佚外，其書俱存<sup>29</sup>。元儒衛富益，亦從金履祥學，著有《四書考證》<sup>30</sup>。仁山的弟子中，尤以許謙白雲最為知名，著有：《讀四書叢說》八

---

<sup>24</sup> 《元史》，卷一七一 劉因傳

<sup>25</sup> 臺北故宮所藏為三十六卷本。《四庫全書 經部四書類》所收係二十八卷本。其間差異可參吳哲夫 劉因及其四書集義精要（善本書志）（臺北：《故宮季刊》第十一卷，第一期，六十五年秋），頁 66-頁 68。

<sup>26</sup> 《經義考》，卷二 0，頁 5，朱彝尊引《姓譜》：「起宗內邱人，嘗從劉因游，得道學之旨，教授於鄉。」

<sup>27</sup> 《經義考》，卷四四，頁 11 引《金華縣志》：「倪公晦字孟暘，師事何北山，仕為運幹。」故《宋元學案》列為北山門人，見卷八二。

<sup>28</sup> 孫克寬著： 元代金華學述 謂：「我總覺得元代金華之學，應該以金仁山為開山，前乎此的何、王兩人，雖係金氏本師，而時代不同，環境亦異。」 又頁 24 謂：「若論元代金華之學，自當以金履祥為開山之祖。」（哈佛燕京學社資助印行，東海大學出版，一九七六年），頁 22。 其實孫克寬此說正可與前面所引柯紹忞《新元史 儒林傳序》所謂：「朱子之學得履祥的與謙而益尊」一語相表裡。

<sup>29</sup> 金履祥傳 見於《元史》卷一八九、《新元史》卷一三一、《宋元學案》卷八二等。

<sup>30</sup> 《經義考》，卷三八，頁 8，朱彝尊引《浙江通志》：「衛富益，崇德人，從金履祥學。」



卷。謙講學為師達四十餘年，弟子殆千餘人，形成了所謂的金華學派<sup>31</sup>。下逮許謙弟子，如呂洙著《大學辨疑》一卷、呂溥著《大學疑問》一卷、蔣玄有《大學章句纂要》一卷、《四書箋惑》等，都是朱子《集注》之流裔。

除上述之外，另有饒魯一支，也是傳朱子之學。饒魯有關《四書》類的著作計有：《論語石洞紀聞》十七卷、《孟子紀聞》、《庸學十一圖》一卷、《中庸大學學纂述》二卷。元儒吳迂，即從饒魯雙峰學，為研究《孟子》的大家，著有《讀孟子法》、《孟子集注附錄》、《孟子年譜》、《孟子家記》、《語孟類次》等<sup>32</sup>。又朱公遷著《四書通旨》一書，獨稱饒魯為饒子，實淵源有自。饒雙峰、吳迂、朱公遷之論《四書》，與朱子《集注》雖不盡相同，卻也是朱子《四書》學的反應與迴響<sup>33</sup>。

南方儒學除了北山、雙峰之外，如宋末元初的陳普，閔文振也稱其淵源朱子，其學甚正。陳普作《四書句解鈐鍵》、《四書講義》二卷、《學庸旨要》、《孟子纂要》等書<sup>34</sup>。元儒韓信同之師即是陳普，信同著有《四書標注》<sup>35</sup>。

以上諸家都可說是紹朱子之傳的，其實，還有更多的學者私淑朱子，對發揚朱子學說的貢獻也值得一書。如婺源胡炳文，他一生「篤志於朱子之學，上溯伊、洛」，今天我們仍能見其《四書通》二十六卷。學於胡炳文的張存中，作《四書通證》六卷，附於《四書通》之後，以發揚炳文之學，其書亦存<sup>36</sup>。又如陳櫟，

---

<sup>31</sup> 《元史》，卷一八九，許謙傳。

<sup>32</sup> 黃虞稷曰：「迂字仲迂，浮梁人，從饒雙峰學。皇慶間，浮梁知州郭郁延之為師，以訓學者，人稱可堂先生，汪克寬，其門人也。」清·黃虞稷著，盧文弨、吳騫校補：《千頃堂書目》卷一，頁15，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一九九〇年五月）。

<sup>33</sup> 《宋元學案》全祖望云：「雙峰亦勉齋之一支也，累傳而得草廬。說者謂雙峰晚年多不同於朱子，以此詆之，予謂是未足以少雙峰也。」卷八十三，頁87。《四庫全書總目》謂朱公遷之學：「所引諸家之說，獨稱饒魯為饒子，其淵源蓋有自矣。」清·紀昀等著：《四庫全書總目》，卷三六，頁10，（臺北：藝文印書館，七十八年一月）。

<sup>34</sup> 《經義考》，卷三八，頁8，朱彝尊引《閩書》：「陳普字尚德，別號懼齋，福寧人，居石堂山，學者稱石堂先生。宋鼎既移，三辟本省教授，不起，作《四書句解鈐鍵》、《學庸旨要》、《孟子纂圖》、《周易解》、《尚書補微》、《四書六經講義》，凡數百卷。」又引閔文振所作傳：「石堂先生聞恂齋韓氏倡道浙東，負笈之會稽從之游。韓之學出慶源輔氏，輔氏，朱門高弟也。淵源所至，屹為嫡派，故其學甚正。」

<sup>35</sup> 《經義考》，卷八六，頁6，彝尊引《閩書》：「信同字伯循，寧德人，受業陳普之門。」

<sup>36</sup> 《經義考》，卷四三，頁5，彝尊引《新安文獻志》。又《四書通證》前有胡炳文序，雖稱存中為「友人」，實則是學生，故王德毅等編《元人傳記資料所引》卷二、頁1131便謂

《宋元學案》入為〈滄州諸儒學案〉下卷，也視其為朱門再傳弟子一類。櫟著有《中庸口義》一卷、《論語訓蒙口義》、《四書發明》三十八卷、《四書考異》十卷。《元史》說他：「嘗以謂有功於聖門者，莫若朱熹氏，熹沒未久，而諸家之說往往亂其本真，乃著《四書發明》、《書傳纂疏》、《禮記集義》等書、亡慮數萬言，凡諸儒之說有畔於朱氏者，刊而去之；其微辭隱義，則微而伸之；而其所未備者，復為說以補其缺，於是朱熹之說大明於世。」<sup>37</sup>。由「有畔於朱氏者，刊而去之」一語可見他護衛朱子之心，由「其微辭隱義，則微而伸之；而其所未備者，復為說以補其缺」之言可見他發明朱子之志。倪士毅之師即陳櫟<sup>38</sup>，士毅著有《四書輯釋》三十六卷，為明代《四書大全》所本，而《大全》反不如倪氏《輯釋》詳備。又如元末的史伯璿，全謝山的《宋元學案》列之於 木鐘學案，蓋伯璿師友為陳剛公潛，公潛學於永康胡石塘，石塘之學源出於葉文修，文修與木鐘均師事朱子，故伯璿治學甚能篤信堅守朱子之學，著有《四書管窺》十卷<sup>39</sup>。

我們依循著張溥、黃百家論宋元學術傳承的關係，不厭其煩地列舉上述實例，目的乃是要用以說明一個事實，那就是：元代諸儒，不論其是否為朱子所傳，他們都以發揚光大朱子《四書》學為己任，尤其他們勤於著作，致力講學，終於使朱子的《四書集註》立於一尊之地。因此朱子《四書》學之可永傳於後者，固然因為朱子《四書》著作的精密博大、也因為宋末諸儒能傳續鑽研，尤其是因為元代諸儒的推尊與發揚。

### 三、帝王的獎勵與提倡

朱子學說雖然博大精深，但終宋之世，並未受到真正的重視。狄百瑞氏說：西元一二三〇年，宋室固然重新恢復了朱學的地位，但這麼做只不過為

---

存中「學於胡炳文」。

<sup>37</sup> 《元史》，卷一八九，頁 4321。

<sup>38</sup> 《經義考》，卷八十六，頁 8，朱彝尊引趙汭曰：「倪氏世家，休寧先生諱士毅，仲弘其字，其師曰陳壽翁。」又顧炎武《日知錄》卷十八，頁 650，四書五經大全 條云：「倪氏《輯釋》今見於劉用章所刻《四書通義》中。永樂中所纂《四書大全》特小有增刪，其詳其簡或多不如倪氏。」清·顧炎武著、黃汝成集釋：《日知錄集釋》，（湖南：岳麓書社，一九九四年五月）。

<sup>39</sup> 《宋元學案》，卷六十五，頁 61。

了挽救朝廷令譽，除虛榮之外，並不能提高朱子甚或朝廷的聲望。南宋理宗在位之初，雖曾將朱子與其他新儒家從祀於孔廟之內定期祭奠，並曾提倡教育、講勵學術。卻因後來終日享樂不理朝政而終致亡國。至於宋室將朱學訂為科舉取士的標準，似屬確立朱學正統地位的必要措施，但此類促使朱學制度化的辦法，在朝廷日益衰落的情況下，不過是虛有其表，徒具形式，對朱學本身毫無裨益。<sup>40</sup>

宋末的朱子之學既是「虛有其表，徒具形式，對朱學本身毫無裨益」，元代初期的環境，對朱學的發展也無甚裨益。因為蒙古人入侵以來，不改其游牧民族征戮殺伐的特性，且嚴格區分百姓的等級，只比乞丐高一級的儒者在當時備受歧視。因為他們在統治者的眼中，儒者不如醫生、工匠、獵戶、農夫來得有用；在百姓的眼中，儒者又不如道士、和尚那樣能談玄說理創造奇蹟。所以元初的社會與政治環境對儒家學說的發展而言，是相當不利的<sup>41</sup>。但從另一個角度看，蒙古人重視長幼尊卑的秩序，遵守「約孫」（習慣）和「札撒」（法令）的文化要求；互相合作、彼此尊敬；重視誓言、蔑視謊言等倫理道德，其實也頗與儒家傳統觀念相通不悖<sup>42</sup>。

大體說來，元自世祖忽必烈以前，漢、蒙文化互相影響，蒙元諸帝王稱不上漢化，但漸接觸中華文化則是事實。如元太祖成吉思汗入侵金後，金代亡臣郭寶玉便建議太祖頒布新令，不妄殺百姓<sup>43</sup>。及至太祖攻破中都（北京）（一二一五），耶律楚材（一一九〇至一二四四）之被選用，尤有重大意義<sup>44</sup>。耶律楚材

---

<sup>40</sup> 狄百瑞著、施寄錦譯：《元代新儒家正統思想的興起（上）》，（臺北：《思與言》第二一卷，第一期，一九八三年五月），頁 43。狄百瑞甚至以為：宋亡時，趙復竟然不死，並北上教導程朱之學的原因乃是「早期韓侂胄對新儒學的迫害」。《元代新儒家正統思想的興起（中）》，（臺北：《思與言》，第二一卷，第二期，一九八三年七月），頁 234。

<sup>41</sup> 同前註，《元代新儒家正統思想的興起（上）》，頁 55—頁 57。

<sup>42</sup> 史衛民著《元代社會生活史》，頁 298—頁 306，（北京：社會科學出版社，一九九六年一月）。

<sup>43</sup> 郭寶玉傳 見《元史》卷一四九，又畢沅《續資治通鑑》卷一九五謂：「郭寶玉既以軍降，又言『建國之初宜頒新令』，蒙古於是頒條畫五章，如出軍不得妄殺，刑獄惟重罪處死，其餘雜犯量情處決。軍戶蒙古色目每丁起一，漢人有田四頃，人三丁共簽一軍，年十五以上成丁，六十以下破老。貼戶與軍戶同。民匠限地一頃，僧道無益於國，有損於民者，悉行禁止之，皆寶玉所陳也。」

<sup>44</sup> 《元史》，卷一四六，耶律楚材傳。

共經太祖、太宗二朝，影響至鉅<sup>45</sup>。孫克寬總論耶律楚材的事功有兩點：

一是在大汗左右，承機勸諫，減少殺戮，如前述的保全汴京，和解放俘囚。一是建議用漢法，使儒學得漸次注入，此點以太宗代金之後，於各路開科試士，為最有影響。許多儒生因召試中第，而漸入仕途；其不做官的，也以儒戶而復其租稅，解脫奴隸的生活，這對那壹代的北方文人，真是造福無疆<sup>46</sup>。

所以宋子貞 元故領中書省耶律公神道碑 稱讚耶律楚材：

國家之興，肇基於朔方。太祖皇帝以聖德受命，恭行天罰，馬首所向，蔑有能國。太宗承之，既懷八方，遂定中原，薄海內外，罔不臣妾。於是立大政而建皇極，作新宮以朝諸侯。而公以命世之才，值興王之運，本之以廓廟之器，輔之以天人之學。綿二紀，開兩朝，贊經綸於草昧之初，一制度於安寧之後，自任以天下之重。屹然如砥柱之中流，用能道濟生靈，視千古無愧者也。<sup>47</sup>

繼「綿二紀，開兩朝，贊經綸於草昧之初，一制度於安寧之後」的耶律楚材之後，另一個對輔佐帝王保存漢族文化有功的為全真教的丘處機<sup>48</sup>，姚從吾比較耶律楚材與丘處機的貢獻：

耶律楚材博學多能，周旋於成吉思汗、窩闊台汗及蒙古大臣之間；從政治、經濟、文化諸方面，盡心匡教，保全漢地人民，維護漢地文化。丘處機則從宗教方面、精神方面、行為方面說服成吉思汗，取得大汗的信任。藉宣揚全真教，因以保全各地的漢人，維持漢地的秩序。就中全真教對挽救民

---

<sup>45</sup> 孫克寬撰：《元初儒學》曾分析耶律楚材以儒術施諸政事的具體事實共七項：一、奏立十路課稅所，以救中原之廢為牧地，所荐長官，皆用儒者，使儒生漸次抬頭。二、建議諸路軍民分治。三、救免汴梁的屠城之劫。四、索亡金禮樂及名儒梁陟等北上。五、於燕京置編修所，平陽置經籍所，以開文治。六、奏開俘囚之禁。七、議定中原戶賦、奏括戶口皆籍為編民，力陳時務十策，如信賞罰、正名分，皆儒家傳統的治術。孫克寬著：《元初儒學》，（臺中：東海大學出版），頁 34。

<sup>46</sup> 同前註。

<sup>47</sup> 元蘇天爵撰：《元文類》，卷五七。

<sup>48</sup> 姚從吾謂：「在這一段期間（第十三世紀初），中原漢地人民與蒙古可汗猶能大體上勉強相處者，實有賴於兩個傑出人物的周旋與盡心匡教。一位是契丹貴族而早已漢化的儒者耶律楚材。一位是全真教的第二代教主，長春真人丘處機。姚從吾著：忽必烈對於漢化態度的分析，〈《大陸雜誌史學叢書》第一輯，第六冊，頁 307-309。〉

族文化的劫運，貢獻尤大。<sup>49</sup>

在太宗窩闊台汗時，另有楊惟中(一二〇五至一二五九)提倡儒學，也值得一書。

《元史》本傳說他：

皇太子闕出伐宋，命惟中於軍前行中書省事，克宋棗陽、光化等軍，光隨隕鄂復漢州，及襄陽德安府凡得名士數十人，收伊洛諸書還燕都，立宋太儒周敦頤祠，建太極書院，延儒士趙復、王粹等，講接其間，遂通聖賢學。憲宗即位，世祖以太弟鎮金蓮川，乃立河南經略司於汴梁，奏惟中等為使<sup>50</sup>。

由上述可知惟中「收伊洛諸書還燕都」、「立周敦頤祠」、「建太極書院」、「延儒士趙復、王粹等講接其間」等，均是於窩闊台汗時期提倡儒學的具體事跡與貢獻。

不論郭寶玉、耶律楚材、丘處機或楊惟忠，他們所處的時期都是動蕩征戰的時代，太祖與太宗對內政或文治問題實無暇顧及，對儒家思想也無法全面推動施行。及至太宗滅金之後，漢地秩序如何恢復？爾後如何治理大元帝國？都屬十分急需迫切的問題。繼太祖與太宗之後，蒙哥汗即位，即憲宗，當時漠南漢地擾亂不治近四十年，君民都想早日恢復社會的安定與秩序。忽必烈為憲宗同母弟「最長且賢，故盡屬以漠南漢地軍國庶事。」推行漢化，崇尚儒術，樹立一代宏遠的規模，是世祖忽必烈最了不起的功業。

元世祖忽必烈的生平事蹟見《元史世祖本紀》卷四至十七，幾佔《元史》的十二分之一，內容可說十分豐富。由這些資料中，可看出他在憲宗時即開府金蓮川，總理漢事、延攬人才、以備顧問。《元史》稱他在潛邸時即：

思大有為於天下，延藩府舊臣及四方文學之士，問以治道。<sup>51</sup>

其企圖心旺勝若此。姚從吾曾分析忽必烈對於漢化的整個態度有三：

一、他生性仁明英睿，思大有為於天下。當時他感到漠南廣大的漢地不治，認為是一個嚴重的問題，因而延訪藩府舊臣（如董文用、趙璧等）及四方文文學之士，研究和解決這個問題。二、他知道治理漢地需用漢

---

<sup>49</sup> 同前註。

<sup>50</sup> 《元史》，卷一四六，楊惟中傳，又卷一八九，趙復傳，謂：「惟中聞復論議，始嗜其學，乃與樞謀建太極書院，立周子祠，以二程、張、楊、游、朱六君子配食，選取遺書八千餘卷，請復講授其中。」亦可與此相發明。

<sup>51</sup> 《元史》，卷四，頁 57。

唐成法，又因邢州大治與關中大治兩個實例，更加強他對於選用漢人，恢復漢法可以治理漢地的信心。三、因此他即決心在漠南採行漢化，任使所知漢人和色目人，立經陳紀，樹立一代宏遠的規模了<sup>52</sup>。

世祖不僅重用漢地大臣，如劉秉忠、張文謙、姚樞、竇默、董文忠兄弟等，認為他們忠貞不貳，智略過人。甚至對被俘的若干學者，也備予禮遇尊隆，如張德輝、元裕（好問）、郝經、趙復、許衡、楊恭懿等，甚至在野的蕭爽、劉因等，也尊以師儒的地位。我們將透過下列各家的敘述，以見忽必烈略提倡漢化儒治的梗概：

### 1、劉秉忠（一二一六至一二七四）與張文謙：

二人均邢州人，邢州是忽必烈最早所受分地之一，劉秉忠既是個禪宗和尚也是個儒家士大夫。忽必烈在金蓮川幕府時期即留秉忠在潛邸以備顧問，凡建元中統、立中書省、設宣輔司、定國號「元」都自秉忠啟之。秉忠並薦張文謙可用。此二人以引薦人才為己任，使忽必烈益重儒術<sup>53</sup>。

### 2、張德輝與元好問（一一九〇至一二五七）：

忽必烈在潛邸召見張德輝，德輝告訴忽必烈：孔子雖歿已久，但其性「與天地終始，無往不在。」又對忽必烈辯說金非以用儒而亡之理。德輝在薦舉人才上也是不遺餘力的，如魏璠、元好問、李冶，白文舉等人，均為德輝所薦。德輝並與元好問請王為儒學大宗師<sup>54</sup>。

### 3、姚樞（一二〇二至一二七九）：

他不僅調解蒙哥汗與忽必烈的衝突，並使忽必烈相信不殺一人能使天下治的儒家理論，種下忽必烈釋放被俘學者並從而重用的原因。姚樞在儒學上尤為有功，《神道碑》記他退隱之後：「自版小學書、《語》、《孟》、《或問》、《家禮》、俾楊中修版《四書》、田尚書版《詩》，折衷《易程傳》、《書蔡傳》、《春秋胡傳》。又以小學書流佈未廣，教弟子楊古，為沈氏活版，與《近思錄》，《東萊經史論說》諸書，散之四方。」性理之書能傳於北方，儒學能廣泛推行，實應

---

<sup>52</sup> 姚從吾著：《忽必烈對於漢化態度的分析》，頁 309。

<sup>53</sup> 《元史》，卷一五七，劉秉忠傳。

<sup>54</sup> 《元史》，卷一六三，張德輝傳、元好問傳。見《金史》卷一二六 德明傳 附。

歸功於姚樞<sup>55</sup>。

#### 4、竇默（一一九六至一二〇八）：

竇默與姚樞均是忽必烈的心腹與幕僚。竇默自讀《四書》之後以為：「初未嘗學，而學自此始。」他並在潛邸為忽必烈講三綱五常、誠意正心之道。姚樞、許衡均由他的推薦而受忽必烈重視。忽必烈曾說：「如竇漢卿之心，姚公茂之才，合而為一，始成完人矣。」<sup>56</sup>

#### 5、趙復：

當蒙古人攻佔趙復的故鄉德安（今湖北省）後，趙復苟全性命於亂世，隨姚樞北上。《元史》謂其北上之後在儒學上的貢獻：「復以周、程而後，其書廣博，學者未能貫通，乃原羲、農、堯、舜所以繼立天極，孔子、顏、孟所以垂世立教，周、程、張、朱所以發明紹續者，作《傳道圖》、而以書目條列於後；別著《伊洛發揮》，以標其宗旨。朱子門人，散在四方，則以見諸登載與得諸傳聞者，共五十有三人，作師友圖，以寓私淑之志。取伊尹、顏淵言行作希賢錄，使學者知所嚮慕，然後求端用力之方備矣。」不只楊惟中、姚樞均因此而嗜儒學；下逮許衡、郝經、劉因都因此而尊信儒家。《元史》儒學列傳以趙復為首，實其來有自<sup>57</sup>。

#### 6、許衡（一二〇九至一二八一）

許衡是忽必烈時推行儒術最重要的大臣。忽必烈曾多次召見許衡，尤其是至元三年夏四月，衡向忽必烈奏陳「時務五事」最為重要，此五事相當於元朝的治國藍本<sup>58</sup>。他不只講求政治、經濟、社會與學術問題，於醫藥方劑、星曆兵刑、食貨水利、諸子百家，均有討論。許衡年輕時，即與竇默交往。後來前往蘇門訪求姚樞，得伊川《易傳》，晦庵《論孟集註》、《中庸大學章句》、《或問》、《小學》等書，讀之，深有默契于中，遂一一手寫以還。聚學者謂之曰：「昔所

---

<sup>55</sup> 《元史》，卷一五八；又《元朝名臣事略》，卷八。

<sup>56</sup> 《元史》，卷一五八。

<sup>57</sup> 《元史》，卷一八九。

<sup>58</sup> 《元史》，卷一五八，許衡傳，所謂「時務五事」：一曰立國規模，二曰中書大要，三曰為君難，四曰農桑學校，五曰慎微。

授受，殊孟浪也。今始聞進學之序，若必欲相從，當悉棄前日所學章句之習，從事於小學，洒掃應對，以為進德之基。不然，當求他師。」許衡對朱子的著作（尤其是《四書》）奉若神明，羅整庵說他：「始終尊信朱子」，姚牧庵說他：「一以朱子之言為師」，薛瑄說：「自朱子歿，得朱子心學者，許魯齋一人而已。」他對朱子學說信仰的虔敬可謂至死方休，陳剛總論許衡的貢獻：「自許文正公起，學者宗之而莫貳。其學尊信朱子，而濂洛之道益明。使天下之人皆知誦習程朱之書，以至今日，公之力也。<sup>59</sup>」。孫克寬也說：「正統的如儒學，僅有姚趙諸人，仍不能在北方學術界立足。因為趙係南方老儒，不能有聲氣之呼應；姚係名宦，不能專力於獎學；惟有許魯齋出來，才大開庭戶，使有元一代，尊崇儒學，程朱義理，定於一尊。」<sup>60</sup>

#### 7、董文炳兄弟：

董文炳兄弟：文蔚、文用（一二二三至一二九七）、文直、文忠與其父董俊、子士元、士選均仕於元，他們原是元初藩府舊臣中的大族之一，在世祖居藩邸時，即入侍世祖，效忠沙場，一門貴顯。兄弟數人中，尤以文忠最篤信儒家。文忠反對舊時科舉以詩賦為重的方式、而應究心孔、孟之道，研讀經史之義。一次世祖問他實行貢舉的意見，文忠說：「陛下每言：士不治經究心孔孟之道，而為賦詩，何益治國？由是海內之士，稍知從事實學。今臣所誦，皆孔孟言，烏知所謂道學哉？」文忠不以自己顯赫的武官世家為傲，讚成試以經義的科舉方式，以裨益人心。對世祖影響很大<sup>61</sup>。

#### 8、楊恭懿（一二二五至一二九四）：

這個造「授時曆」、「大衍曆」的重要學者，不只定訂元代曆法，對儒家思想也是具體實踐的：「年二十四，始得朱子《集註章句》四經、《太極圖》、《小學》、《近思錄》諸書，誦其言而惟其意，嘆曰：『人倫日用之常，天道性命之妙，皆萃此書。今入德有其門矣，進道有其途矣，吾何獨不可及前脩踵武哉？』」

---

<sup>59</sup> 以上所述許衡種種係據《魯齋遺書》卷末 神道碑 ，《四庫全書 集部別集類》。

<sup>60</sup> 孫克寬著：《元初儒學》，頁 45。

<sup>61</sup> 《元史》，卷一四八，卷一五六。



### 9、郝經（一二二三至一二七五）：

郝經原是元好問金朝文學集團的成員之一，後來轉變而為儒學的信仰者與提倡者，所以《宋元學案》將他列為《江漢學案》。他「才識超邁，務為有用之學。上泝洙、泗，下迨伊、洛諸書，經史子集，靡不洞究。<sup>63</sup>」忽必烈開府金蓮川時，郝經即受賞識，留府顧問。他進文氣磅礴的《東師議》，反對憲宗入蜀。憲宗崩逝，他立刻向忽必烈進班師議，「率輕騎而歸，直造燕都」，奪位成功。孫克寬說：「這些人都是讀儒書的。外之姚樞、郝經、商挺；內之張文謙、趙良弼、廉希憲等，同謀贊畫，竟成大事。使忽必烈以劣勢的地位擊敗阿里蒙哥，和漠北的蒙古一系的親王貴族集團，不可不謂儒生們出色的表現。<sup>64</sup>」後來他出使宋朝，被拘十六年，卻始終守節不屈。像這樣一個有了不起的事功表現，更有傲人的氣骨的儒生，怎不教世祖對漢法重視，對儒教崇敬？

### 10、劉因（一二四九至一二九三）：

因生於蒙古滅金之後，元軍南下滅宋之際，他的一生幾乎是隱逸以終。在學問上，他與許衡一樣發揚深究周、程、張、邵、朱、呂之學；也極其尊奉朱子；傳言他對許衡出仕為宦頗為不滿<sup>65</sup>。世祖雖於至元十九年、至元二十八年兩度徵召劉因，皆辭不就，世祖嘆曰：「古有所謂不召之臣，其斯人之徒與？」<sup>66</sup>

忽必烈以其過人的睿智、英明的大才，廣納四方之士，我們看上述諸人，有

<sup>62</sup> 《元朝名臣事略》，卷十三。

<sup>63</sup> 《元朝名臣事略》，卷十五，頁 294–頁 295。

<sup>64</sup> 孫克寬著：《元初儒學》，頁 55，又《元史》，卷一五七，郝經傳。

<sup>65</sup> 陶宗儀《輟耕錄》卷二，記劉因謂許衡「公一聘即起，毋乃太速乎？」又《宋元學案江漢學案》，全謝山以劉因譏諷許衡辭執政而就國學之事。但這段記載，袁冀已考其誤，因為如據《輟耕錄》所說為中統元年事，那麼劉因當時年齡不過十二歲而已。見袁冀《元名儒劉靜修行事編年》，收於其所著《元史論叢》內，頁 29，（臺北：聯經出版事業公司，七十五年元月修訂版）。

<sup>66</sup> 《元史》，卷一七一。又黃俊傑據狄百瑞說法以為，元儒在面對「仕」與「隱」、「聖之清」與「聖之任」兩難式之中，常會求一個平衡，這種努力在劉因的身上表現得最為明顯。劉因出處行藏前以進而後以退，蓋因經過出仕之經驗以後，深知時勢之不足行道也。黃俊傑撰：《儒學價值系統中的兩難式——「元代朱熹正統思想之興起」讀後見其所著《歷史的

的是藩府武臣，有的是漢地大臣，有的是被俘的金臣或宋地學者，儘管他們的身分背景不一，但崇尚儒家信仰，推行漢化的態度則無二致。忽必烈受他們的影響，終於在至元八年改國號為「大元」，制訂了兩元化的政治政策，即以蒙古的傳統原則管理蒙古本部及成吉思汗以來所建立的大帝國；以中原漢唐的原則治理漢地，穩固奠定了元代丕基。故《元史》稱頌忽必烈：

世祖度量宏廣，知人善任使。信用儒術，用能以夏變夷，立經陳紀，所以為一代之制者，規模宏遠矣<sup>67</sup>。

西元一三一二年，愛育黎拔力八達即位，是為元仁宗。仁宗年輕時即以「通貫經史，善論古今治亂」的漢族名儒李孟為師，頗受過儒學思想的薰陶。他即位以後，便決定遵循世祖舊制：

帝諭省臣曰：「卿等褒集中統、至元以來條章，擇曉法律老臣，斟酌輕重，折衷歸一，頒行天下。」<sup>68</sup>

這種遵循世祖舊制的方式，尤以提倡儒學、實行科舉最為顯著。他以宋儒周敦頤、程顥、顥弟頤、張載、邵雍、司馬光、朱熹、張拭、呂祖謙及故中書省左丞許衡從祀孔子廟廷<sup>69</sup>。在程試科目方面，也是遵循世祖舊制，如世祖重臣許衡的太學弟子，在討論新制的擬定時即強調：

夫取士之法，經學實修己治人之道，詞章乃摛章繪句之學。自隋唐以來，取人專尚詞賦，故士習浮華。今臣等所擬，專立德行明經科。以此取士，庶可得人<sup>70</sup>。

重視經學、輕忽詞章於是成為元代科舉的準繩。皇慶二年，仁宗接受李孟「科舉得人為盛」的建議，決定實行科舉。命程鉅夫草行科舉詔曰：

舉人宜以德行為首，試藝則以經術為先，詞章次之。浮華過實，朕所不取<sup>71</sup>。

並規定考試內容：「明經、經疑二問，《大學》、《論語》、《孟子》、《中庸》內出題，並用朱氏《章句集注》」；經義「《詩》以朱氏為主，《尚書》以蔡氏

---

探索》，頁 173。（臺北：水牛出版社，七十三年七月初版）。

<sup>67</sup> 《元史》，卷十七，世祖本紀，頁 377。

<sup>68</sup> 《元史》，卷二四，仁宗本紀，頁 540。

<sup>69</sup> 同前註。

<sup>70</sup> 《元史》，卷八一，科舉一。

<sup>71</sup> 同前註。

為主，《周易》以程氏、朱氏為主。<sup>72</sup>」朱子之學終於成為官方取士的準則，成為支配元代社會的重要思想。

要特別說明的是：仁宗皇慶、延祐年間所實施的科舉，有一重要的特色，即「比額制度」，此一制度可保障蒙古人和色目人的錄取名額佔總數的二分之一，漢人佔另外的二分之一<sup>73</sup>。尤其是考試內容，蒙古人、色目人與漢人並不相同，蒙古人和色目人的考題分為二部份，第一部份出自朱熹《集注》，第二部份是一篇五百字左右的策論。漢人的試題相形之下便困難得多，第一部份與上述差不多，第二部份則須探討《詩》、《書》、《易》、《禮》、《春秋》等各經義理，且限定上述諸家宋儒注本。清代學者錢大昕讀到此一階段的考試制度時認為：元代漢人所以必須再做答五經，是因為單考《四書》似嫌過份簡易，那是給非漢人的優待辦法，但《四書》實不能代替五經<sup>74</sup>。總之，如此規定，雖是對蒙古人色目人的便宜行事，卻也更擴大了讀《集注》群眾，普及了《集注》的影響。蓋元代帝王把《集注》看作是培養倫理與公德的共同基教材，從此，朱子的《集注》在元代不只有崇高的一尊地位，更廣泛普遍地成為中國各民族思想與行為的準繩。<sup>75</sup>

#### 四、元儒以《四書》之道為立身治學之始

元儒以《四書》之道為立身治學之始的風氣十分普遍。追究其原因，仍要從朱子說起。宋紹熙元年，朱子刊《四子書》於郡，他叮囑學生：

以《大學》、《語》、《孟》、《中庸》為入道之序，而後及諸經。以為不先乎《大學》，則無以提綱挈領，而盡《語》、《孟》之精微；不參之《語》、《孟》，則無以融會貫通，而極《中庸》之旨趣；然不會極於《中庸》，則又何以建立大本，經綸大經，而讀天下之書，論天下之事哉？<sup>76</sup>

---

<sup>72</sup> 同前註。

<sup>73</sup> 同前註。

<sup>74</sup> 清 錢大昕著：《廿二史考異》，卷九十。

<sup>75</sup> 狄百瑞著、施寄錦譯：《元代新儒家正統思想的興起》說：「（《四書集註》）本身確實適用於多種不同的民族，包括高麗、日本、蒙古和滿人。」頁 334。

<sup>76</sup> 《朱子年譜》，頁 179。又頁 178 謂程子：「河南程夫子之教人，必先使之用力乎《大學》、《論語》、《中庸》、《孟子》之言，然後及乎六經。蓋其難易遠近大小之序，固如此而不

朱子既如此教人，實有其重大意義，陳榮捷認為：

此種安排或視為無關宏旨，但實代表若干重要之發展。首先即意謂以五經代表儒學的權威于此掃除。再者，即顯指直返孔孟之教。<sup>77</sup>

錢穆也說：

孔子教其子，學《詩》學禮，朱子教人則讀《論語》、《孟子》。此非不是，亦並不與孔子意相違。《四書》之教先於五經，正是理學最著精神處。<sup>78</sup>

晚宋以來，士人多遵循如此方法讀書，如陳普：「其用功，本諸《四書》，《四書》通然後求之六經。<sup>79</sup>」。元明善也說：「苟潛心於《四書》，發之以《近思錄》，而後進於《易》、《書》、《詩》、《春秋》，何理不窮？以之修身治人，聖賢事業不外乎是。<sup>80</sup>」迄乎元代，《四書》及朱子《集注》成為治儒學最基本教材，朱子《集注》更是家藏必讀的書籍。虞集為程復心的《四書章圖》所作的序說：

朱子為之《集註章句》，然後會眾說而歸於一，其所以集博約之功者，千古所未有也。凡終始本末之說，內外精麤之辨，條分屢析，粲然有序。今其書家藏而人讀之<sup>81</sup>

這種家傳人誦的情況尤以南方為然，《元史》說：

宋亡，科舉廢，櫟慨然發憤，致力於聖人之學，涵濡玩索，貫穿古今<sup>82</sup>。江南學者慨然發憤，致力於聖人之學最力的，莫若黃榦所傳何基的北山學派。黃

---

可亂也。」比較程、朱說《四書》次序雖有不同，但以《四書》先於諸經的態度則一。《語類》卷十四 第三條記朱子所以如此安排的原因：「要人先讀《大學》以定其規模，次讀《論語》以立其根本，次讀《孟子》以觀其發越，次讀《中庸》以求古人之微妙處也。」

<sup>77</sup> 陳榮捷著：《元代之朱子學》，頁 311。

<sup>78</sup> 錢穆著：《宋代理學三書隨劄》，頁 72，《錢賓四先生全集》第十冊。（臺北：聯經出版事業公司）。呂思勉也說：「《詩》、《書》、《禮》、《易》、《春秋》乃漢人所謂五經，《論語》、《孝經》，漢人皆以為傳，今日研究，傳且更要于五經。」呂思勉著：《經子解題》，頁 83。（上海：華東師範大學，一九九五年十二月）。

<sup>79</sup> 《經義考》，卷三八，頁 8。

<sup>80</sup> 《經義考》，卷二五五，頁 2。

<sup>81</sup> 《經義考》，卷二五五，頁 3。又同卷，頁 2，鄧文原序也說：「自《四書》之學行，家傳而人誦之矣。」

<sup>82</sup> 《元史·儒學一》，卷一八九，頁 4321。

榦曾說：「先師文公之學見之《四書》，而其要尤以《大學》為入道之序。<sup>83</sup>」流風所及，北山諸儒尊信《四書》的態度尤為堅定。如北山首見勉齋，臨川將別，授以熟讀《四書》之訓<sup>84</sup>。黃宗羲甚至認為北山宗旨：「熟讀《四書》而已。」<sup>85</sup>。北山弟子王柏與其友汪開之同讀《四書》，取朱子《論孟集義》，別以鉛黃朱墨，以求朱子去取之意<sup>86</sup>。王柏弟子金履祥，早在他受業之初即聽從王柏關於為學之方在於「立志」，讀書之目自《四書》始已的告誡，所以他有關《四書》的著作上甚多，已如前所述。至於許謙，我們由他說：「聖賢之心，盡在《四書》；而《四書》之義，備於朱子。<sup>87</sup>」一語，便可見他對朱子《集注》信仰的虔誠與堅定了。所以吳師道曾說：「欲通《四書》者，必讀朱子之書；欲讀朱子之者書，必由許君之說。<sup>88</sup>」。凡此，都可見朱子《集注》見重於北山學派的一斑。

此一風氣一直持續至元末。如元末的景星說自己：「年十六始得出就伯父黃先生學。先生曰：『汝欲為學，必先熟讀《四書》，以為之本，而後他經可讀矣。』星於是晝誦夜思，不敢少惰。益知《四書》奧義不可不窮矣。<sup>89</sup>」又如汪克寬也說要以「《四書》為六經之階梯」，《四書》中尤以朱子之書為最：「《四書》者，六經之階梯。東魯聖師以及顏曾思孟傳心之要。而我紫陽子朱子，且復集諸儒之大成，擴往聖之餘蘊，作為《集註》、《章句》、《或問》，以惠後學。昭至理於皦日，蓋皦皦乎不可尚已。<sup>90</sup>」這種以《四書》為六經之階梯，以朱子《集注》皦如皦日的態度，是終元不輟的士風。儘管元代儒者所精通的五經互有不同，但他們對《四書》幾乎都有著述或心得。這也是促使朱子《集注》於元代興盛的另一重要原因。

---

<sup>83</sup> 宋黃榦撰：聖賢道統傳授總敘說，《勉齋集》，卷三，頁19。

<sup>84</sup> 宋王柏撰：何北山先生行狀，《何北山先生遺集》，（臺北：商務印書館景《四庫全書》本，七十五年三月初版），卷四。

<sup>85</sup> 《宋元學案》，卷八二，頁13。

<sup>86</sup> 同前註。

<sup>87</sup> 黃潛墓志，在元·許謙所著《讀四書叢說》前，頁2。《四部叢刊·續編經部》，（臺北：商務印書館）。

<sup>88</sup> 同前註，頁1—頁2，元·吳師道讀四書叢說序。

<sup>89</sup> 元·景星所著學庸集說啟蒙序，《學庸集說啟蒙》，序，頁1。《通志堂經解·經部四書類》，（臺北：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）。

<sup>90</sup> 元·汪克寬撰：四書輯釋序，《重訂四書輯釋章圖通義大成》四十卷，〈序〉，頁1，（臺北：國家圖書館藏）。

## 參、餘 論

在幾篇討論有關元代四書學興起的文章中，諸多學者對朱子《集注》之大興於元有不同的看法。如劉子健以為，韓侂胄的死亡、宋代皇室繼位的風潮、宮廷的鬥爭、蒙古南侵的危機以及蒙古與宋政權在文化上的競賽 等因素都共同促成了朱子《集注》地位的上升。此外，科舉在社會上的誘惑力、出版的普及、貨幣經濟的盛行、學問範圍的擴大、平民的崛起 等社會經濟方面的變動，也有推波助瀾之功。日人宇野精一則以為，五經是中世社會的產生，而《四書》因其文簡意賅，極具近代之性格，所以《四書》能輕易地取代五經<sup>91</sup>。狄百瑞氏則以為，由於儒者那種「朝聞道，夕死可矣」的貞定力，使儒學得以渡過蒙元時代的考驗向前邁進，尤其那些仕元的中國儒者，對推動朱子《集注》實功不可沒。以上各說，劉子健能從政治、社會、經濟等非思想性的因素考量，確是擴大了思考的面向；宇野則以《四書》簡質的特色為據，也有其獨到的看法；而狄百瑞則是從儒學的內在理路來看《集注》地位上升的問題，頗能彰顯儒學之精神。他們各有所重，也各有所偏。今為此文，希望能著眼大者，希望對元代《集注》之所以興盛的原因作一涵括性地掌握。

元代朱子《集注》興盛的原因既如上述，影響所及，他們多能潔身自愛，重視氣節。北方儒者如趙復不引元兵以伐其父母之國，許衡不食道旁無主之梨；姚樞不事貨賂，隱居讀書；郝經不屈於宋，堅定忠貞；劉因不求聞達，隱居教授等。南方儒者如金履祥入元之後，屏居金華山中，訓迪後學，諄切無倦。許謙不出閭里者四十年，四方之士以不及門為恥。履祥弟子衛富益之悲泣宋亡、隱居講學。許謙弟子戚崇僧、劉涓等，都絕意仕進，安貧樂道之士。這些南方學者，身處異族統治之下，卻勤於儒業，終身隱逸。所以黃宗羲說：

魯齋以下，開門授徒，惟仁山、導江為最勝。仁山在南，其門多隱逸；

---

<sup>91</sup> 劉子健文見：James T. C. Liu, "How Did a Neo-Confucian School Become the State Orthodoxy?" *Philosophy East and West*, 23:4, Oct, 1973。宇野精一見其著《五經 四書 —— 經學史覺書》（京都：《東洋 文化 社會》，第一輯，一九五二年）。又黃俊傑頗讚同把《四書集註》流行於元代的原因擴大來看，他以為，不只要像狄百瑞一樣，從儒學內在思想來看《四書》地位上升的問題，「政治、社會、經濟等非思想性的因素，在《四書》地位上升的過程亦扮演某種程序的角色，值得我們嚴肅考慮。」黃俊傑撰：「儒學價值系統中的兩難式——「元代朱熹正統思想之興起」讀後」，頁 174—頁 175。

導江在北，其門多貴仕。

黃百家也說：

白雲高第弟子雖眾，皆隱約自脩。非巖棲谷汲，則浮沉庠序州邑耳。<sup>92</sup>

這種巖棲谷汲，則浮沉庠序的南方學者的事例，在《元儒學案》、《元史》或《新元史》等書中，俯拾皆是、不勝列舉<sup>93</sup>。總之，不論是北方或南方學者，他們或有所為、或有所不為，不惟在事功上有表現，在治學上有成就，其德行操守尤其令我們景仰。他們之所以能做到這些，實要歸功於他們都是儒家的信徒，是《四書》學說的實踐者，更是朱子《集注》的擁護者！

總結來說，因為朱子《集注》一書的嚴謹可法，精粹可取，使學者於讚嘆敬佩之餘，樂於鑽研發明；因為宋、元儒者的一脈相承的師徒關係，使朱子《集注》可以由宋至元，傳續不輟、發揚光大；因為元代帝王的獎勵與提倡，使朱子《集注》成為所有元代士人必讀的聖典；因為元儒以《四書》之道為立身為學之階梯，使元代士人風骨高潔、勤於講學，著述豐富<sup>94</sup>。這些，都是造成朱子《集注》於元代興盛的原因。

---

<sup>92</sup> 《宋元學案》，卷八十二，頁 43。

<sup>93</sup> 何佑森著：《元代書院之地理分布》：「元代的書院大致分布在東南一帶——長江和贛江流域，然後逐漸向湖南廣東推移。」又說：「有元一代，書院的分布顯然是南勝於北。」何氏雖未指出元代書院之所以會在南方普及，實由於南方儒者的隱逸教授，但此一事實對元代書院在南方的擴充實有助益。（香港：新亞書院新亞學報，一九五六年六月），第二卷，第一期，頁 361－頁 362。

<sup>94</sup> 《元史·儒學列傳一》：「元興百年，上自朝廷內外名宦之臣，下及山林布衣之士，以通經能文顯著當世者，彬彬焉眾矣。」可見諸元儒不唯「通經」亦且「能文」。卷一八九，頁 4313。